

前 言

写这本书的想法本来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来的。斯科特·拉什在德国期间作了一番思考之后，与贝克二人看到了双方著作中的共同思路。又过了一些时候，吉登斯和贝克才相互对对方的著作有了适当的了解。这种三方交流确立之后，本来各不相干的著作围绕着几个关键主题呈现出很多惊人的相互重合之处。尽管三位作者对自反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它是重要的共同的关键主题之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久拖不决，已使我们厌倦，而且类似争论到头来毫无结果。不管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表达，自反性现代化的思想打破了这类争论往往会强加于概念创新之上的束缚。

如果理解恰当的话，破除传统的观念是第二个共同主题。如今，破除传统一说乍看起来显得奇怪，特别是在某些后现代思维强调传统复兴的情况下更显得离奇。然而，破除传统并不是说没有传统的社会——实际上与此相去甚远。这个概念是指一种传统在其中发生了地位变化的社会秩序。在全球性世界大同主义的情境中，今天的传统必须为自己辩护：它们需正常接受质询。在这个方面 尤为重要 的是 包括影响性属、家庭、地方社区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传统在内的现代性的“隐性根基”暴露无遗并需接受公众的

辩论。此中含义深远，影响全世界。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第三个共同主题。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也有不同点，但我们都同意，生态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环境”的关心。“环境”听起来似乎是人类行动的外部情境，但生态问题之所以走向前台是因为“环境”实际上已不再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是受到了人类生活的彻底渗透和重新整理。如果说人类曾经知道“自然”是什么，那么现在则不然。“自然”之物与“生活”之物完全搅在一处，对此已不能再想当然。与受传统统治的生活的许多其它方面一样，在人类必须进行实践决策和道德决策之处，“自然”便转变为行动之域。“生态危机”开掘出一系列的与今日之人类生活的可塑性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命运”的隐退。

滋养了后现代观点的人类知识的悖论——在后现代观点中它们往往与认识论的消亡有关——现在可以从更加世俗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证，即使是短期内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风险”的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

在这些情况下，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组织的性质和全球系统的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全球化过程加剧的趋势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交互作用，并偶然可能成为日常生活变化的条件。许多变化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最有影响的政策决策并不是来自正式的政治体系这个正统的决策领域。相反，它们塑造并帮助重新界定正统政治秩序的性质。

从这些问题的分析中得出了实际的政治后果。这些政治衍生物究竟可能是什么，我们见解不同，诊断各异。社会主义解体后，许多作者认为主动的政治计划已无用武之地，在其著作中明显表露出政治意志瘫痪的苗头，对此我们都不赞成。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具有发达的自反性的世界中，对社会形态的质疑是司空见惯的，在很多情况下这正好刺激主动的批评。

本书的格式是这样的：我们每人就自反性现代化中的方方面面各自独立写了一篇长文。尽管我们未有意掩盖我们之间的不同见解，但三篇论文均以上述看法为指导。接下来我们每人又针对另两位作者的文章作出了批评性的反应，这部分文字以与论文排序相同的次序出现在本书的末尾。

乌尔里希·贝克的文章由马克·里特尔(Mark Ritter)从德文翻译成英文。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1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 理论初探

乌尔里希·贝克

导言：何谓自反性现代化？

似乎可以这样预测，1989年将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日期载入史册。现在我们很清楚，1989年是共产主义世界意外解体的一年。不过，50年后被记住的还会是这一点吗？到那时，东欧和中欧的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垮台是否会被解释成与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国王储有关呢？尽管西方国家表面上稳定并采取自我放纵的立场，但西方显然已经受到东方国家瓦解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而又颇受关注的论点。西方正面临着挑战其社会政治体系的根本前提的诸多问题。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具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历史性共生现象能否在不耗尽其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回归看作正是对全球一体化过程的反应吗？

既然工业化社会的旧体制正在其成功的过程中解体，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常规”战争又重新被发现的痛苦现实中，难道我们不该得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乃至再造我们的工业文明的结论吗？新的社会契约不正在待产之中吗？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1]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 从而使生产关系 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因此 现代社会凭藉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当然也削

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形态。在这个新阶段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这便是我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

工业社会的活力削弱其自身基础，这一概念使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说法，但它的含义完全不同。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这也就意味着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新格局与业已失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断言的是，高速的工业活力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社会，无需初始阶段爆发革命，绕开了政治争论和议会与政府的决策。

那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a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

可以断言的是，不会发生革命但却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而这恰恰是简单现代化问题上的两大权威派别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者异口同声认为绝不可能的。在此我们打破的禁忌是把社会变化的潜在性和内在性暗中划等号的做法。从一个社会时代到另一个社会时代的过渡可以是无意的、非政治的，可绕过所有政治决策场所、路线冲突和党派论战，这种思想与社会学的基本信念相抵触，同样也与这个社会流行的自我理解相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它首先是标志着社会剧变的分崩离析和痛苦经历。然而，事实上不必如此。新社会并不总是诞生于痛苦。日益增长的贫困、不断增加的财富和东方对手消失使问题的类型、相关程度以及政治性质的坐标轴发生了变化。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技术化以及很高的就业保障可以释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

例如，妇女走出家庭、更多地参与工作受到了所有政治党派的欢迎和鼓励，至少在口头上如此，但它也在慢条斯理的传统职业、政治和个人秩序中引发了剧变。雇佣劳动的时间和契约的弹性化是许多人争取和推动的目标，但总的来说它打破了工作与非工作的旧界线。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巨大的积累作用的小手段的到来并没有相伴随的大张旗鼓的运动、议会中有争议的表决、有计划的政治对抗，也没有举着一面革命性变化的大旗，所以可以说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静悄悄地发生了，没有受到仍然在毫不犹豫地继续在老框框中收集旧数据的社会学家的怀疑。这种微不足道的、熟悉的、可取的变化掩盖了其改变社会的程度。人们相信，再多的此类变化也不会产生任何新质的东西。

想得到的 + 熟悉的 = 新的现代性。这个公式听起来矛盾重重，看上去疑窦丛生。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规模广阔、结合松散且结构在不断变化的自反性现代化应得到的不仅仅是慈善的好奇心。从政治上说，这种现代化之现代化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现象。首先，它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难以界定的深层不安全感；同样难以界定的派系斗争在所有层面上展开。与此同时，自反性现代化只包含

一种发展动力；尽管这种动力处于不同的背景下，但却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和不同的大陆上，与此相接合的有民族主义、大众贫困、各种教派和信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可能还有战争和革命，更不要忘了还有灾难性大事件——即狭义上的风险社会的冲突动力——所引发的紧急状态。

自反性现代化当然得在分析上区别于传统类型的社会变化——如危机、社会转型和革命，但它也可能与这些传统的概念相吻合，支持、重叠或强化这些概念表述。因此，我们必须问下列问题：

第一，自反性现代化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何种社会危机？

第二，何种政治性挑战与自反性挑战相联系？对这些挑战原则上可有何种回答？

第三，自反性现代化与对抗性。发展一繁荣与社会安定、危机与大规模失业、民族主义、世界性贫困、战争或新的移民浪潮——两者叠加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在国家间比较和不同文化间比较的矛盾格局中，自反性现代化应该如何解码呢？

现代性运用其自身时，它拥有自我控制和自我限制的方法吗？这种方法是否只会在失控的事件旋涡中再释放出一圈旋涡呢？

风险社会的自我批评

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

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

有两个阶段应该加以区分：第一个阶段系统性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这些影响和威胁尚未成为大众问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在此阶段，工业社会的自我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由决策产生的威胁作为“残留风险（“残留风险社会”）不断增值并被“合法化。”

第二个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在这个阶段，工业社会的制度成为其自身所不能控制的威胁的生产者和授权人，此时，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社会仍然根据旧工业社会的模式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利益组织（interest organizations）司法制度和政治受到了源出风险社会的活力的争论和冲突的困扰。

反思与自反性

根据这两个阶段的划分，“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可以与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区分开来。这个概念并不是（如其形容词“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样）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几乎可以这样说，风险社会的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

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

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这种冲突应明白无误地区别于在现代化自我反思的意义上的知识和科学化增加。且让我们把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称为自反性 (reflexivity) [以区别于反思 (reflection) 并与之相对照]。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指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其制度化的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3]这种格局在后来的第二阶段可能会成为 (公众的、政治的和科学的) 反思目标，但这一事实决不能混淆转变过程中未经反思的准自主机制：产生并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的正是抽象化。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作为经典工业社会的基本冲突并在相关制度内引起解决这些冲突的企图的好处 (收入、工作、社会保障) 分配冲突被“坏处”分配冲突掩盖了。这些冲突可以理解为责任分配 (distributive responsibility) 冲突。它们的爆发牵涉到如何分配、预防、控制和认可好处生产过程中伴随的风险 (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对环境的威胁、过度军事化以及西方工业社会之外的日益贫困化)。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这就提出了发展的自我限制问题以及从潜在的威胁出发对已获得的 (责任、安全、监督、灾害控制以及灾害后果的分摊方面

的)标准进行重新制定的任务。然而,问题是后者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而且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危险的定义总是一个认知的、社会的概念。只要现代社会不发生变化、不对其自身的影响进行反思并我行我素地继续执行同一种政策,那么现代社会便会对抗其自身模式的基础和极限。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的转变。

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的存在是工业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但现代化完全确立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这适用于非人类的自然和总的人类文化,也适用于文化生活方式(如核心家庭和性别秩序)和劳动资源(如家务劳动习惯上根本不被视为劳动,尽管家务劳动正是使丈夫的工资劳动成为可能的第一要素)。^[4]

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它们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这适用于诸如商业、法律或科学等社会要素,但在政治行动和决策领域内则成为一个特别问题。

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某个团体的意义之源(如阶级意识或对进步的信念)正在枯竭、解体、失去魅力。这些意义之源支撑着西方的民主国家和经济社会一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它们的丧失导致了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所有界定努力,这便是“个性化过程”这个概念的含义。不过,现在的个性化具有十分不同的含义。齐美尔、迪尔凯姆和韦伯在 20 世纪早期从理论上塑造了这一过程并在各个阶段对它进行阐释;对他们来说,不同点在于如今人

们并未被从封建和宗教超验的确定性中“释放”到工业社会的世界中，而是被从工业社会中释放到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骚动中。人们可能会生活在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相互矛盾的全球性风险和個人风险中。

与此同时，至少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里，这种解放发生在福利国家的大环境中，也就是说，其背景是教育的扩大、劳工市场上对流动性的强烈需求和劳动关系的高度发达的法律化（juridification）。这些情况使得个体（the individual）成为个人（an individual），或者更确切地说，仅仅成为个人——成为权利（和义务）的对象。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和矛盾等原本可以在家族和村社中或通过求助于社会阶级或社会团体而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诚然，家庭仍然存在，但核心家庭已日渐稀少。不平等日渐增加，但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意识已失去其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即便自我也不再是明确的自我，而是分裂为自我的矛盾话语。现在，个人必须掌握这些“风险机遇”^[5]，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却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决策，即考虑到可能的后果。

不确定性的回归

我们也应该在这种情境中考虑今日之“生态危机”的本质。工业生产的看不见的副作用转变为全球生态危机的焦点，这似乎已不是我们周围世界中的问题——即所谓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只要这些发展被放在工业社会的概念范围内加以观察，那么，作为显然属于负责任和可

以计算的行动的反作用，其毁灭系统的作用便不会被发现。其系统性的后果只会出现在风险社会的概念中和视界中，这时它们才会使我们认识到一种新的自反性自主自决的必要性。在风险社会中，对由技术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威胁的不可预测性的认识需要对社会凝聚之基础的自我反思和“理性”的普遍准则和基础加以审察。在风险社会的自我概念中，社会具有狭义上的自反性，也就是说，社会成为其自身的一个主题和问题。

这些使人着恼的事的核心可以被描述为“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中。”在此“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中”首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已不再被当作秩序问题而是被当作风险问题。这些风险问题的特征是没有确定的解决办法；更确切地说，它们的特点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可能性计算加以领会，但却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消除。风险问题的根本性矛盾使其有别于从定义上说倾向于明确性和可决定性的秩序问题。在明确性的缺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且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对社会的技术可行性失去信心几乎是必然的。^[6]

风险的范畴代表了马克斯·韦伯所根本没有想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行动。它是后传统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理性的，至少是不再具有工具理性。然而，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只有到正常化之时——无论是超越了保险范围的工业发展的正常化还是风险探索和风险的感性形式的正常化——风险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以其自身的手段从内到外抵消和打破秩序问题才能够辨别出来。风险与数字共张扬。风险总是可能性，仅此而已，

然而却又不排除任何事物。今天，当一种风险接近零时，我们可以以此赶走批评者，但由于误解了可能性论断，明天灾难发生后我们便只能为公众的愚昧而哀叹。风险具有无限可再生性，因为在多元社会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根据某些决策和观点对决策作出评价，而风险则随着这些决策和观点而自我繁衍。例如，如何把企业、工作、健康和环境风险（这些风险反过来又可划分为全球的和地方的，或者主要的和次要的风险）加以联系、比较并划分出等级呢？

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因为专家预设了文化接受，这正是专家们所应促成和生产的。德国人眼看着世界与他们的森林一起消亡；英国人对他们早餐中的毒鸡蛋感到震惊：这正是他们皈依生态的开端。

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视野随着风险的增长而模糊。因为只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逃避的需要主导着风险。把世界描述成风险的人最终将失去行动能力。最突出的一点是，控制意图的扩张和强化最终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然而，这就意味着风险不仅预设着决策而且最终还个别地且在根本意义上解放决策。风险问题不可能转换为秩序问题，因为后者为风险问题所固有的多元性窒息，在统计数据的表面之下暗中变形为道德问题、权力问题和纯粹的决策主义（decisionism）。换一种方法说，它还意味着风险问题需要——或者更慎重地说诉求——“承认矛盾”（齐格蒙特·鲍曼语）^[7]

鲍曼在评论^[8]《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时批评了“乐观主义”——有人可能称之为幻觉——这也是我的调查分析的一个基

础。从我的角度说，这种评论基于这样的普遍误解，即风险问题是秩序问题或至少可以这样看待。它们正是如此，然而它们恰恰又不是如此。它们是控制和秩序的工具理性逻辑受其自身动力盲目牵引的形式（从“自反”的角度加以理解，也即看不见的、不受欢迎的，而不必从“反思”的角度来理解，见上文）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条裂缝，现代性内部在理性的基础和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冲突，且这正发生在工业现代化的核心（而不是其边缘或与私人生活世界交叉的区域内）。

工业社会、民众的社会秩序、特别是福利国家和保险国家^[9]必须能够使人类的生存状况可由工具理性控制并使之可制造、可获取（单个地、合法地）可解释。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的难以预见的一面以及控制的需求的滞后效应反过来又引出了原以为业已克服的不确定的领域、矛盾的领域——总而言之是异化的领域。然而，现在这也是社会的多种声音的自我批评的基础。^[10]

可以指明的是，不仅组织形式和组织措施不适应于用来理解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回归并使之合法化，伦理的、法律的原则和范畴——如责任、内疚和（追查损害时）污染者付出代价的原则——有些政治决策程序（如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适应。与此类似，在必须得到呈现和理解的大量矛盾事实面前，社会科学的范畴和方法也失灵了。

在此不但有决策的必要而且必须为决策、效度关系以及对不可预见和不负责任的后果（从控制主张中得出的概念）的批评重建规则和基础。社会发展的自反性和不可控制性因此侵入了个人的分区，打破了地区的、特定阶级的、国家的、政治的和科学的控制范

围和疆界。在面对核灾难后果的极端情况下，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反过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

换言之，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自我批评倾向的社会。保险专家（不自觉地）与安全工程师发生冲突。在后者诊断出零风险时，前者则断定不可担保。对立的专家之间相互拆台或挖墙角。政治家遭遇到公民团体的抵抗；工业的管理层则遭遇到有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行政机关受自助团体的批评。最终，甚至污染部门（如海洋污染中的化工行业）也必须预备着来自受影响部门（如渔业和沿海旅游业）的抵抗。后者可对前者进行质询、监督甚至可能修正。风险问题甚至能分裂家庭以及从熟练的化工工人一直到管理层的职业团体^[11]甚至常常足以分裂个人。心中所想和口中所说可能并不是手中（最后）所干的。

在此，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那些根本性弥漫的、具有矛盾的和牢骚满腹的政治倾向和后果的多元对立；有经验的批评家可以并且将会视之为“肤浅”不会影响社会发展的“逻辑”而不愿加以考虑。然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有可能成为风险时代的特征。这个冲突已经在暗中破坏并凿空旧工业社会的政治坐标——即聚集在安全—不安全二元对立周围并试图相互区分的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政治对立。在政治意义和存在意义上，此处的根本问题和决策是，新制造出的不可计算性和无序是否会根据工具理性控制的模式相对立呢？也就是说，它们是否会求助于工业社会的旧物（更多的技术、市场、政府等）呢？或者说，一个新思路和一种新的行动方法是否正从此开始、接受并确认

这种矛盾但又所有社会行动领域中产生深远影响了呢？为了与理论的轴线保持一致，前者可称为线性的，后者可称为自反性的。与对这一区分的分析性和经验式的阐释相并列，对这些成对的术语进行‘政治性经验式的’和‘规范的哲学的’阐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这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理论的原理论的（theoretical meta-theoretical）格局随着自反性现代化的出现而出现并进一步强化。只有在重新界定现在的过程中，旧秩序的大坝才会崩溃，难以克服的矛盾——风险文明的新秩序——才能公开出现。因此，能够生产出与行动相关的具有约束力的秩序和安全推定（security fictions）的社会形态（角色模式）越来越少了。工业社会安全推定的这种危机意味着，行动的机遇和强迫性展开了，人们永远必须在二者中间择其一，不可能拥有任何决定性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据此，生活和行动在不确定性中成为一种基本体验。反过来，谁能做到和学到这一点、如何做、为何做或为何不做，这些又成为当代的关键的个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

许多人说，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垮台拆散了所有社会批评的根基。实际上正好相反：批评的情境是前所未有的地有利。甚至连激进批评的情境也是如此。批评的僵化——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理论在批评界的知识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含义之一——去不复返了。万能的缔造者死了。实际上，社会评论现在可以吐纳新鲜空气，睁开并擦亮其眼睛了。

在世界历史和知识历史的舞台上，主体地位的许多候选人上上下下：工人阶级、知识阶层、公共领域、具有形形色色的倾向和构